

#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

周 扬

同意胡乔木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问题的讲话。我也讲点意见。我讲的题目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发给会议的“哲学社会科学八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只是一个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致的规划，一个粗略的蓝图。这个规划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于大家的讨论、修改、补充，使之趋于完善，在执行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加以修订。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当是有计划的。我们有自然科学、技术的规划，也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比较起来，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更困难一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它要随国内外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变化，因此，社会科学的规划就不可能那么稳定，那么严整，它的伸缩性、流动性就比较大。比如，在清除“四人帮”以前，我们的规划中能够列入“四人帮”批判这样的项目吗？当然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这却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项目。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由于大家的努力，过去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远，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世界威望，是很不相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时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哲学社会科学遭到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研究工作陷于停滞的状态，混乱和倒退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作过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但是规划执行的情况是不好的，这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这些过去参与管理过学部工作的人，特别是我个人，工作没有做好，也是有责任的。

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开始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兴旺的气象，人们对它的期望是很殷切的。由于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规划方面缺少经验，又由于目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还不健全的现状，所以今天要制定一个既有雄心壮志而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是有不少困难的。例如，现在我们的规划大都只是列举了许多必需的应有的项目，而没有规定每个项目要探讨什么问题，哪些单位或个人担任这一项目，完成这一项目的期限是多少时间。又如：有比较长远的基本建

设性质的著作，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史、世界史、断代史及各种专史等，又有配合当前斗争任务的著作，如“四人帮”批判等；有集体写作，也有个人专著。所有这些项目都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按照轻重缓急的程度不同，适当安排，不可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我们的时代不只需要大量的政论性通俗性的小册子，也需要，甚至更需要有高度思想学术水平的大部头著作。我们要大力组织集体写作，但也不可以忽略个人的专长和志趣。集体写作班子要有一个有眼力、有见解而又善于群策群力、博采众长的主编。总之，现在的规划还只是一个草案，一个粗线条的东西。但有规划总比没有规划好，规划也只能从粗到细，而且也不可能太细。将来冒出一鸣惊人的著作，很可能超出于我们这个规划之外。文化史上多少鸿篇巨制，多少惊人之作，有几本是规划出来的？几乎都不是的。但尽管如此，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规划还是需要的、必要的，它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它指明哲学社会科学的航向，促进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清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上的一大障碍，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有了重要的保证。现在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制定、讨论和执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了。现在党中央、华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这就向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课题，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属于思想、理论的领域。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我们的理论是否有用，就看它能否满足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需要，能否满足加速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以及满足得好还是不好。违反这个需要，是根本不允许的。满足得不好，软弱无力，也是不行的。

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定要和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一定要和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的斗争结合起来，要为此总任务的实现服务。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的长远的任务。我们的研究工作，脱离了当前现实的斗争，那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两条针锋相对的思想路线。究竟是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呢？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死记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这就是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争论的问题。经过这场大辩论，巩固地树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路线的正确，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承认。在十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亲眼看见了的，是被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经验，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创造性地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党内出了林彪、“四人帮”这样一批最阴险最凶恶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顶峰”，才是“绝对权威”，他们打着“忠于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偶像化”，“宗教化”，这样来彻底地、肆无忌惮地践踏毛泽东思想，以达到他们背叛毛主席、篡党夺权

的罪恶目的。我们党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对党内最大的阴谋家、野心家的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又出了个勃列日涅夫，他们以清除“个人迷信”为名，砍掉了斯大林这面伟大的旗帜，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一时，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尽管如此，并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任人们比较和选择，这就大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林彪、“四人帮”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名，极大地玷污了这面伟大的旗帜，他们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更阴险、更毒辣地来砍毛主席这面伟大的旗帜，在我们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但也没有能够把这面旗帜砍倒。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能力是空前地提高了。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中，广大革命青年表现了为坚持真理，不怕挨打，不怕坐牢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就证明，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捍卫者，真理是在他们手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砍不倒的。那些担心“砍旗”的人们，是完全想错了。“砍旗”的刽子手是林彪、“四人帮”，肃清了这些坏蛋的思想流毒，就是保卫了这面伟大旗帜不被污染褪色，保持了它的鲜红的色泽。在革命人民的保卫下，我们更高地举起了这面旗帜，这是真正的高举。

最近报刊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就是涉及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究竟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这是有关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大问题。

这个讨论是很及时的，很有必要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讨论所取得的成果，不止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

要把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所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首先就要端正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把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毛主席在有名的《实践论》中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中，类似这样的话不知说过多少。那些热衷于背诵个别词句的人为什么偏偏忘记了这些最重要的话呢？我们所说的实践，当然不是狭小的个人的实践，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有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怀疑，不赞成，对讨论这个问题不热心，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表示惶惶不安的情绪。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除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之外，就是因为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所以他们害怕实践、害怕群众，他们不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看问题、办事情，而是根据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看问题、办事情。当客观实际和他们的主观愿望、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不是努力使自己的主观符合于客观，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在实践标准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只反映了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哲学社会科学是党性很强的科学，有资产阶级派性，就没有无产阶级党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有个人私心，谋个人私利，这

样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在乎口号喊得多响亮，在这一点上有谁能够及得上林彪呢？而在于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对毛主席全部学说，能否作出符合实际，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比较正确的阐述和解说，而更重要的是在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用，就是我们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研究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现状，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号召我们写近百年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我们至今没有交卷。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论述当代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三十年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本根据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还没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也没有一本阐述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概括性的著作。两年来，报刊上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是很多很多的，但象《反杜林论》那样的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著作却还没有，虽然“四人帮”在学术上远远不能和杜林相比，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过杜林。现在，社会科学院正在组织力量编写这些著作。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这类著作也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最为盼望的。我们应当满足他们的这种热烈期望。明年是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又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有些纪念性但又是学术性的有分量的著作问世。我们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著作具有我们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想学术水平，但也不能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正确。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世界上是没有的。有的同志说：“人无完人，书也不能有完书。”我很赞成这个意见。要求太高，就反而达不到目的。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还处在一个草创的时代，我们在学术上成熟的程度还很不够。一本著作，只要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有些创见，不是人云亦云，也就可以满意了。

为了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研究当前的问题应当占据优先的地位。但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和研究本国的遗产，却是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外古今。研究方法，也正如毛主席所曾经很形象地说过的，是中外古今法，这个中外古今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研究和解答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割断历史联系地来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

由于“四人帮”长期实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蒙昧主义的反动政策，我们对于外国的事物本来了解不够，就越发生疏了。清除“四人帮”以后，我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向外国交流科学技术文化，向外国学习，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了。对中外文化学术交流，我们应该抱更自觉、更主动、更热情的态度。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华主席也一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要打破“夜郎自大”的思想。毛主席说向外国学习，要有勇气。什么“勇气”呢？就是放下架子，不夜郎自大。我们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要向外国学，这点是没有谁能够反对的了。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否也要学，是否也有可学之处呢？这就有问题了。要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应当学。每个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文化和反人民的文化。我们不但要学别人的先进经验，也要研究别人的反面经验。作为批判的对象，也作为自己的鉴戒。这就是“洋为中用”的意思。

一百多年前，《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过，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相应地也开创了世界

文学，即世界文化。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片面性越来越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终于被打破了。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传播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欧洲并不总是中心。古埃及、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波斯、印度和中国，都曾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对世界文化作出了特殊伟大贡献的古希腊，就是吸取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化营养。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在亚洲地区。在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我国唐代的文化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只是到了十四—十六世纪，欧洲才有“文艺复兴”，十八世纪才成为“启蒙的世纪”。十九世纪在德国人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是英、德、法三国理论思想发展和工人运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思想移向东方，在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再向东移，在亚洲中部的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人类文化的中心和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这样往返流动，影响遍及全世界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总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推移的。我们应当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和评价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

我国有三四千年的绵延不断的有文字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清理这份宝贵财富，重新给以估价和利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意思。我国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对它加以革命的改造。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总结当前的运动，参照外国的先进经验，吸取本国历史文化的精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在各个学科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我们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极端反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批判他们以贯串所谓“儒法斗争”的主线来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用“影射史学”借古讽今，作为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手段。我们要还自己国家的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作出符合实际的公正的评价，既不要美化他们，也不要丑化他们，不要把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有的思想感情强加在他们身上。现在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许多学者，由于他们本国的战略需要，或者出于他们本人对研究中国的求知欲望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都在纷纷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现状、历史和文化，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种“中国热”。比起他们的努力，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研究就显得太不够，太逊色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我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规划能否付诸实施，变成行动，化为成果，这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持续的艰苦的劳动，还需要创造保证完成这些规划的各种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否发展和繁荣起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得如何。

自从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二十三年过去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则提出更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提出了。毛主席关于这个方针反复地作过多次的论述。这是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贡献。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又多次指示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把这正式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成为我国根本大法之一。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研究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这个方针，本来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存在阶级斗争，要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个前提下提出的，是根据科学、文化艺术工作本身的特殊规律提出来的。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激烈的斗争过程。既有人民内部矛盾，又有敌我矛盾；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有两种倾向的斗争；既要反对右的或修正主义的倾向，又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简单粗暴的倾向。两类矛盾，两条道路，两种倾向，互相交错，互相转化。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非常微妙而又尖锐的。毛主席一提出这个方针，就遭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和反对。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他们怕这样一来，从此天下就大乱了。毛主席从爱护同志出发，及时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还有的同志怕犯错误，提出了“力求避免毒草”这样的口号。毒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要避免就是一厢情愿，主观幻想，就是不敢正视毒草，害怕和毒草斗争，软弱无力，精神状态不健康。毛主席批评了这种想要“避免毒草”的错误思想。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但这个进攻很快地就被打退了，天下并没有大乱，党和人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学术界、文艺界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的空气。但是这个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消极的现象，有的还是很严重的。这里，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也有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于执行了“放”的方针，“放”是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也不在于“放”出了一些牛鬼蛇神，毛主席说过“牛鬼蛇神”并不可怕。“有一点也可以”。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于“放”多了，也不在于放出了毒草，我们没有加以禁止。禁止是容易得很的。但禁止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的错误是在放松了思想斗争。毒草有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毒草却没有足够有力量的反映社会主义的作品和有分析、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去批判它、胜过它、压倒它，更重要的是对毒草嗅觉不灵，不能辨别，失去抵抗和批判力。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主要教训也在这里。由于对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支持不力，有时甚至对之采取简单粗暴的或过分挑剔的态度，这就使得具有传统势力和社会影响的旧文化和旧思想反而在许多场合占据了优势，使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本来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四人帮”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打着反对“四旧”的幌子来扼杀社会主义新文化，使最腐朽、最反动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反而得以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乘机得逞。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和江青之间就曾有明显的意见分歧。我们曾反对过对待文化工作的粗暴态度，江青却说我们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仿佛粗暴就等于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就以最粗暴、最专横、最野蛮的法西斯式的手段来横扫一切，清除一切他们不顺眼的、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東西。古典的和现代进步的中外书刊几乎全被禁止出版和阅读，许多好的电影和戏剧都遭到禁锢的命运。江青对文化艺术创作实行了最粗暴的专制和垄断。她窃取和霸占了所谓“革命样板戏”，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一切艺术创作都要按江青他们的什么“三突出”一类的公式来向壁虚构。稍稍摆脱了江青的控制，反映了革命生活的真实的电影《创业》就被扣上“十大罪状”而大张挞伐。在

“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本来应当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却变成一片荒芜，死气沉沉。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正当文化生活的权利。人民和广大青年缺少最起码的精神食粮。精神的饥饿是和肉体的饥饿一样难以忍受的。许多青少年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就去看手抄的黄色小说，看有害的侦探故事，寻找各种无聊的消遣。不少人在精神上被“四人帮”所腐蚀，丧失了理想，看不见前途，没有信念，一片虚无主义。有的人就走上了堕落犯罪的道路。这就是“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没有了”。这种状况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不只是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问題，也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題，关系对广大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总之，关系到最广大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和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文艺界和科学界同“四人帮”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采取各种形式，有时隐蔽，有时公开，一直没有停止。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在人们思想上所设置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破。他们套在人们的脖子上的种种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人们还是“心有余悸”。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人们“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必将逐渐成为过去。但是要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还需要时间，需要彻底摧毁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禁区”及其所遗留的恶劣影响。

我们说过，科学无禁区。设置和承认禁区，就是承认世界上有些事物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就是否认科学的权威，就是宣扬不可知论、神秘主义，宣扬迷信。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其所以存在“禁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由于人类知识发展的水平和社会划分为阶级，对人们的思想来说，“禁区”从来是存在的，现在存在，将来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科学还和自然科学不同，是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科学，关系每一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实际利益，触犯它们的利益总是不允许的，“禁区”就更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阶级的消灭，思想“禁区”越来越缩小，直至完全消灭。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将获得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以图腾为标志的原始氏族社会，人们崇拜动物，视某一特定动物为神圣不可侵犯，为谁也不许碰的“禁区”。“禁区”最初是和迷信联在一起的。任何宗教，无论是原始宗教，或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禁区”，无数坑害人的清规戒律。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禁区”也更厉害了，清规戒律也更多了。摩西“十戒”，头一条就是：“我是你们的上帝，除我之外，你们不可信别的神”。别的神通通不准信，全是“禁区”。宣传无神论，更是大逆不道的，在“福音书”中无神论就等于魔鬼。在罗马教皇的血腥镇压下，谁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思想，就要活活烧死。布鲁诺就是一个为了坚持科学真理，不怕烧死的千古卓越的英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那种教皇势力的血腥统治，长期支配人民思想的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吃人的礼教。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在五十四以前，批判孔子是不允许的，是“禁区”。虽然嵇康早就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大胆的话，但没有动摇得了孔子的权威。直到明代李卓吾公开提出反对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这才在封建学术界中引起了一场风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把李卓吾作为

他们的一个光辉先驱是有道理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子这个偶像才动摇了，关于他的“禁区”，才算打开。欧洲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启蒙世纪，有几百年的时间，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是清扫得比较彻底的。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它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虽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封建意识的残余还是相当大量的存在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是有必要的。毛主席一方面非常重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我国全部历史遗产，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批判孔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彪、“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也转移了批林批孔的方向，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各种表现，仍是当前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封建宗法思想是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惊人了。

在封建宗法意识形态中，君和父的观念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创立林氏王朝，江青想做党的主席，当女皇。在我们党内出现这种怪现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们看到，有些负责干部，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单位当作自己的“世袭封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们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是“土皇帝”。在这种人的权力管辖范围内，就遍地是“禁区”，处处有“忌讳”。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禁区”、“忌讳”不是多到不可胜数吗？一千多年前，唐代的韩愈，写过一篇短文，叫着《讳辩》，就是批判“忌讳”的，诗人李贺考进士，因为他父亲叫晋肃，“晋”和“进士”的“进”字同音，他去考就犯了禁，因此有人反对他去考。但是以推崇孔子著称的韩愈，从爱护年青天才诗人的观点出发，却赞成他去考，韩愈是言必称孔孟的，他说孔子并没有立这种规矩。现代人是很难了解这种奇怪的、荒谬绝伦的规矩了。“四人帮”给人罗织罪名，造成大批冤案、假案、错案，他们所立的规矩，其荒谬绝伦的程度竟远过于此。

我们所以要彻底摧毁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是因为他们是禁革命人民的，而不是禁反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是反革命。现在有些人还不认识这种“禁区”的为害之烈，它堵塞言路，破坏民主，窒息革命精神，扼杀民族生机。有些人在摧毁了林彪、“四人帮”的“禁区”之后，还想继续设新的禁区，下新的禁令。这就是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至今顾虑重重，“心有余悸”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我们是最大多数人向最少数人的专政；我们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我们并不设置什么“禁区”，只有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才禁止。我们禁止的方法也主要不是靠行政命令，我们是靠亿万人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武器，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批评和斗争。资本主义世界总是夸耀他们的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是虚伪的，骗人的，因为在它们的国家里，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就缺少宣传的自由。新闻、广播、出版等宣传手段都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反对对人民的思想设“禁区”，也反对什么“绝对自由”的虚伪思想，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化”。

我们实行的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必须很好地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包括理论、政治、经济三个方面，这三者是互相配合，互相联

系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它要统帅学术、文化，贯穿于学术、文化之中，但不能代替学术、文化。政治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把政治和学术混同是不对的，把二者截然分开也是不对的。有些同志有一种幼稚的错误的想法，要求在政治和学术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样，我只要不越出这个界线就什么危险也没有了，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想一劳永逸地划出这样一条固定不移的界线，这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稳定的、经常变化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界线难划，就索性不划，而是更要经常注意地、细心地、谨慎地来划，使我们的政治和学术文化经常保持统帅和被统帅的正常关系，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协调。对学术文化来说，政治问题，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很多同志还“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四人帮”不但把学术文化问题都当成政治问题，而且把政治问题都当成敌我矛盾问题，这样“无限上纲”，人们就不能不提心吊胆了。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对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都应如此。政治问题不但有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别，就在人民内部矛盾中，这种矛盾的性质也有各种错综复杂的不同情况。毛主席曾经说过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照一般情况来说这是难以设想的，但这种特殊情况确是存在的，如果不承认这种特殊情况，就不能对章士钊这个人作出公正的判断，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著作就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我这里不过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如何重要罢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学术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更不能简单地把政治问题都归结为敌我矛盾的问题。和学术、文化有更加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不但包括着政治观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包括着学术观点和对其他一切事物的观点。人们的世界观往往不是统一的，而是矛盾的，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世界观简单地说成要么是唯物主义，要么是唯心主义，要么进步，要么反动。就在进步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由于他们的思想视野的宽阔程度的不同，斗争经验的丰富程度的不同，历史文化知识的修养程度的不同，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其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总之，我们对学术文化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有分析的态度，要想采取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类复杂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党中央、华主席号召我们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在涉及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每个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既要十分慎重，又要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意见，反对错误意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对重大原则问题要敢于明确表示态度，敢于点头，敢于摇头，如果点错了，摇错了，允许大家批评，也允许被批评者反批评。这样大家都知道该说什么，该作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作什么，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能够得到保证，那么，无所适从，“心有余悸”的精神状态就可以逐渐消除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又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是党员所应有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敢于纠正错误，只要真理在手，什么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都是毫不足畏的。问题是你所坚持的是不是真理，这就不能依个人的主观来判断，而要靠千百万群众的客观实践来检验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最正确的方针，也是最正确的方法。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反过来，不很

好地执行这个方针，就不能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问题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

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自由发展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我们的学术、文化就会停滞不前。如果说我们的政治需要民主，我们的学术文化就更需要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它们就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自由讨论，特别要保护和鼓励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学术观点。可以说，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没有真正的艺术；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就没有真正的学术。

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要不要在学术文化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的问题，要不要满足社会主义新时期广大工农兵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问题，相不相信群众的政治和艺术的鉴别能力的问题。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我们的文化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对立起来，把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需要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看到，群众对文化的需要，越来越高了，方面越来越多了，远非解放区时代，也非开国初期所能比拟。群众的眼界和识别力也越来越高了。究竟是领导高明还是群众高明呢？我看还是群众高明。许多问题，往往只有通过群众的讨论，通过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才能弄得清楚。群众最熟悉生活，对政治也最敏感，而领导往往是落后于群众的。这点，我们应当有自知之明。

要不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要不要按照学术文化工作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的问题。任何工作不按照它的规律去办，总是要碰壁的。行政方式、简单粗暴、官僚主义，对学术文化工作是特别有害的。我们一定要改进领导作风，学会新的领导方法。

我国形势大好，困难不少，前途无量。我们大家努力吧。

---

（上接第 46 页）

新的技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巨大的进步。它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新的技术革命造成工人劳动性质的变化，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工业化，使得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大大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开始缩小。这次技术革命加上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原因，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技术进步使得家务劳动机械化，使得劳动时间有了缩短的可能。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72 页）既然科学成为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它也就成为历史的愈来愈有力的杠杆。

阐明科学技术是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从根本上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发展科学技术的伟大意义，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也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至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愈来愈重要的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就是我们党确定科技路线、方针、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之一。